

1605

延津文史資料

第六輯



政协延津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延津县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延津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办

华北石油局印刷一厂印刷

印数:1-1000 书号 00196

延津县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(内部资料)

政协延津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
编审人员名单

总编审：张振贵 王吾美

编 审：王志华 李贤才 李 献
李志玺

校 对：李志玺 李贤才 李 献

延津县文史资料 (第六辑)

延津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办
华北石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0 千字
印数：1—1000 书号 00196

目 录

“酸枣”名县探因揣谈

——读史札记…………… 张济恩(1)

话“洪洞迁民”…………… 李贤才(4)

解放前夕的延津县城商业 …… 申雨田(53)

舞台三姊妹

——记李湘云、李宝珠、李秀云的表演艺术

…………… 裴明芝 李贤才(72)

延津一中校史漫谈…………… 刘存才(117)

我的老师刘绍周…………… 申雨田(167)

附录:

一、古代最著名的两个乡规民约 …… (185)

二、古代的三教九流十家 …… (200)

“酸枣”名县探因揣谈

——读史札记 张济恩

《延津县志》载，秦始皇五年（前 242 年）“以境内多棘，置酸枣县”后，至宋政和七年（1117 年），延津一直以“酸枣”名县；而“酸枣”作为地名，则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（公元前 543 年）》已有记载。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还举为名地典型，“酸枣以棘名邦，故曰‘酸枣’”。棘，“小枣丛生者，从并棘”（《说文解字》），正是我们常说的“酸枣棵”。然我每读至此，心中生疑，古延津大地，北临黄河（明成化十四年（公元 1478 年）黄河最后南迁出县境），西仰太行，这块冲积平原上所长草木之繁茂者，绝非仅仅“酸枣棵”而已，

话“洪洞迁民”

李贤才

数百年来，包括延津在内的冀鲁豫大地，流传着洪洞迁民的故事，不少人说自己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，老家在洪洞县大槐树老鸱窝（为误传，实为“老鸱窝，鸱，音笛，长尾野鸡）。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？迁民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诸省，地域辽阔，不要说大槐树老鸱窝了，就是整个洪洞县怎有那么多民可迁？我县历史资料是否有接纳迁民的记载？境内哪些村庄或姓氏是迁来的？哪些村庄或姓氏是原有的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近时查阅了《明史》、《明太祖实录》、《明成祖实录》，明、清两代《延津县志》、《胙城县志》、十余部姓氏《家谱》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。结

论是肯定的：明初，迁山西民于延津、胙城，历史上实有其事；说自己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，老家在洪洞县大槐树老鸱窝，是事出有因，言有所据；目前县内各个村庄或氏族哪些是迁人家，哪些是原有之户，少数能够澄清，多数难以分辨清楚，留待今后进一步查阅资料，进行考证。

洪洞迁民，是明王朝建立后为发展中原生产，解决山西“有丁无田”和“丁多田少”之民生活困难的一项重大举措。元朝，自建立到灭亡数十年间，一贯对外用兵侵略异族，对内镇压起义军，战争连年不断；国库空虚，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；群众纷纷起来反对；黄河屡次决口，蝗虫接连发生；群雄并起，互相残杀。致使河北、河南、山东诸地，赤地千里，村落萧条，人烟稀少。明洪武元年，朱元璋曾说：“今丧乱之后，中原草莽，人民稀少”。明洪武

十八年，他又说：“中原诸州，元季战争，受祸最惨，积骸成丘，居民鲜少”。同年，明督府左断事高巍在上表中说：“臣观河南、山东、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，自兵燹以来，尽化为藁葬之墟。土著之民，流离军伍，不存什一”。这种人口稀少、土地荒芜、村为废墟的情况，在明清延津、胙城县志中亦有记载，如“沙堤古柳数枝摇，千顷何曾见一苗”。“匹马延津路书程，连村荒草不堪耕”。“邑之有村落也不独胙，邑之有村落而实无村落也则唯胙，全废者无论矣，仅存者亦如将曙之星。大村数千家，小村数家而已”。“小县甚荒凉，年年苦旱蝗，壁破风生居，梁颓月坠床”。其他记载无需多加引证，仅此就足以说明当时延津、胙城的残破景象是多么严重。明洪武十四年，官方统计，河南每平方公里为 12.85 人，“胙城人口仍在千户以下”。延津“户五百四十五”。而迁民之前在境之户就更

少了。

当时，山西的情况与河南就大不一样。元统治者所发动的战争，横征暴敛，残酷掠夺，河决、蝗虫等灾害以及群雄割据、互相残杀，大都发生在中原大地，很少波及山西，其环境相对稳定。加之明王朝初建，吸收元朝失败的教训，注意调整政策，宽恤民力，抚安流亡。因而，人口增加较快。洪武十四年，山西全省四百三万四百五十四人，平均每平方公里 27.52 人，比当时的河南多出一倍。这就在太原、平阳两府以及泽州、潞州、汾州、辽州等地出现了“地狭人多生计难”的问题。对此，朱元璋曾说：“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”。

这样，河南与山西紧密相连的两个省，前者地广人稀、田地荒芜，迫切需要劳力耕种，后者地狭民稠，无地少地的农民生计困难，迫切需要土地，以解决生活问题。加之，明王朝建

立不久，出于励精图治，谋求发展生产，巩固统治的策略，面临这一主客观势态，促使明王朝从最高统治者到各个封疆大吏必须思考、酝酿、决定“迁山西民以实中原”的问题。《太祖实录》对此有多处记述：“河南裕州言本州地广民稀，山西泽、潞等州地狭民稠，乞于彼无田之家，分丁来耕。上命户部如所言行之”。“上以河南彰德、卫辉、归德，山东临清、东昌诸处，土宜桑枣，民少而遗地利，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。乃命后军部督佥事李恪等往谕，其民愿徙者，验丁给田，其冒名多占者，罪之。复令工部往谕”。户部郎中刘九皋言：“古狭乡之民，听迁之宽乡，欲地无遗利，人无失业也。太祖采其议”。“迁山西泽、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闲广之地，会自便置屯耕种”。由上述情况看来，迁山西民于河南等地是明王朝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，目的是使山西人无失业，河南地无遗利。

泽、潞州人。但为什么在广大民间却世代相传，众口一词，都称自己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，明初由洪洞县大槐树“老鹳窝”迁来。甚至出现“只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，仅知大槐树不知生大槐树之村庄”呢？这其中有两种说法，一是洪洞县人多，每次迁民必含洪洞人在内。贺柏寿在其《重修古大槐树处记》里称：“自此以后，移徙于四方者，不一而足。盖尔时洪地殷繁，每有迁移，其民必与”。一是洪洞交通便利，处地适中，移民多在此集散。民国十九年河南许昌人曾广钦在为《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志》里的序言中说：“推厥原因，盖必迁徙之时，驱各属之民，聚洪洞县大槐树下，由此点齐，由此分遣，临别纪念，永久不忘，殆无疑义”。民国六年撰《洪洞县志》卷七《輿地志·古迹》内记：“大槐树在城北二里广济寺左。按《文献通政》：明洪武、永乐间，屡徙山西民于滁、和、北平、山

又建驿站，房舍宽广，廊舍幽雅，常驻驿官，办理四方来往公差事宜。在广济寺旁有一株“树身数围，荫遮数亩”的汉槐，阳关古道从树荫下通过，树上众多老鸱构巢筑窝。年长日久，特别到了冬季树叶凋落之时，老鸱窝在古槐枝叉上星罗棋布，甚为醒目。这样，地处适中，交通便利的洪洞县就成了山西迁民的集散地，房多院广、廊舍幽雅的广济寺和树身数围、荫遮数亩的大槐树下，就成了迁民集后遣前的停留处。被迁之民在这短暂的停留期间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干粗枝茂的大槐树及其枝叉上星罗棋布的老鸱窝。话说到此，事情就一清二楚了，那就是广济寺内，大槐树下，是明初山西迁民的集散地，官方的迁民机构就设在这里，各州县被迁之民都到此集中，办理迁徙手续，领取户部发给的迁徙文书后编队迁送。故世称此地为迁民的“点行处”、“启行处”。被迁之民在临行

前，站在寺院内、槐树下，与家人亲友话旧告别，恋恋不舍，然后各奔去处。因深感前途茫茫，吉凶未卜，故而出走寺院很远很远了，还屡屡回头遥望，但寺也看不见了，舍也看不见了，进入眼底的只有槐枝鹊巢，触景生情，无限伤感：老鹊尚有窝巢，我们徙居何处？因此，洪洞县大槐树老鹊窝，就成了迁民家乡的标志，并且代代相传，延续数百年之久。所以不少人说：自己祖籍洪洞，老家在大槐树老鹊是事出有因，言之有据。但就山西迁出之民的籍贯而言，洪洞人只是其中一部分，或者说是很少一部分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其他州县人。就迁入延津、胙城的山西民来说，多系泽州之高平、阳城、陵川、沁水四县和潞州之长子、屯留、襄垣、潞城、壶关、黎城六县人，而绝非全系洪洞人。

大槐树既书成了“迁民”的标志，那么它

的历史变化以及目前状况怎么样呢？

明初迁民时的广济寺和大槐树，早已被汾水冲毁，而在大槐树的东旁又同根孳生出第二代古槐。这棵第二代古槐早已干枯，1974 年被巨风刮倒。后来，当地政府拨款整修，打了水泥座，树身用几道铁丝固定，重新竖立起来，作为历史迁民的见证。似迁民子孙繁衍一样，在第二代古槐的北旁又同根孳生出第三代古槐，现在枝盛叶茂，成长茁壮。古大槐树迁民遗迹，旧时人们并不十分重视。现在的建筑是民国三十年洪洞人景大启、刘子林倡议募捐而建。这也涉及迁民的历史原因。

清末，景大启在曹州任散厅官吏，交游甚广，上官下民无不接触。当地人知道他为洪洞人时，都倍感亲切，热情相待，说洪洞是老家，自己的祖先是洪洞县大槐树老鸱窝人。有的还拿出家谱让景大启看。此时，刘子林在长山县

任长吏，也有同样感受。二人相商，随有筹建大槐树古迹之意，并在山东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，寄回山西洪洞托人筹划。第二年洪洞人贺柏寿从河南杞县告老还乡，言在豫也有同感，从当地募钱三十九吊，便积极筹建迁民古迹。正在这时，又发生了一件因大槐树庇护了洪洞人民的事，更引起了人民对大槐树的重视。

原来，辛亥革命时，山西赵城（1954年并入洪洞）人张煌率队杀死了巡抚陆钟奇。不久，袁世凯派新任巡抚张锡銓率三镇兵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。卢率部自古道南下，进军平阳（洪洞县属平阳府），所到之处，肆意抢掠，尤为赵城受害最甚。赵城名士张瑞玘曾上书袁世凯与新任巡抚张锡銓，揭露卢部的残暴罪行。书中有“无贫富贵贱，一律抢掠，不余一家，不遗一物，冰雹猛雨，无此遍及。卢军过后，赵城无市，邻无炊烟，鸡犬无声，家无门窗，筒

中篆书“纪念”二字，碑阳镌刻“古大槐树处”五个隶书大字，碑阴刻有叙述迁民事略的碑文。碑亭后面的窑顶上高高竖立着石经幢，它是广济寺的唯一遗物，也是迁民的历史见证。

碑亭的靠西一旁，建有茶室三间，以备槐乡子孙品乡味、话今昔。茶室四柱上刻有两幅对联，其一是：“茶可解烦碧乳澄清通世味，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”。其二是：“香挹行禁留快饮，荫清古道依斜阳”。茶室门楣匾额为“饮水思源”四字。

碑亭南二十余步，建有牌坊一座，年代虽不久远，样式却古色古香，四脚三门，飞檐斗拱，游人留连忘返。牌坊横额迎面镌刻着“誉延嘉树”四字，背面刻着“荫庇众生”四字。横额两面还刻有四首诗。

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对古迹更为重视，曾多次拨款修葺，并派专人管理，育花植树。1952